

学术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高等教育排名（研究）的矛盾状态

耶莱娜·布兰科维奇

耶莱娜·布兰科维奇 (Jelena Brankovic):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 (Bielefeld University) 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 jelena.brankovic@uni-bielefeld.de

过去几十年，各个大学排名相继问世，变得无处不在。尽管人们对排名存有争议，但是大学排名已成为公认的跨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大学排名会永存”，许多学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此深以为然。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学排名存有弊端，各方也对大学排名抨击不断，但是高等教育界的许多人士仍然认为大学排名不可避免，甚至十分必要。为何如此呢？

为什么我们相信大学排名？

要想释疑解惑，我们应更仔细地观察大学排名，研究大学排名如何与文化制度背景产生共振。首先，排名建立在公共竞争之上，有效促使各个大学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大学排名与全球竞争话语之间的近乎天然的关系和力，也许是地缘政治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此外，大学排名与高等教育负有盛名的一些“理性神话”(rationalized myths)相契合，例如战略管理、绩效指标、问责制、透明度、国际化、卓越和影响力等。鉴于大学排名本身具有理性的光环，它们很容易作为“逻辑”工具来培育“神话”，衡量社会是否朝着“神话”前进。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将高等教育机构想象为以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为首的、具有等级制度的机构。这种想象远早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横霸世界”的大学排名。例如，“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News)和上海软科各自第一次发布的排名，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大家心目中“已知”的“最好”大学。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人们对大学排名的接受可能不会如此顺利。大学排名要增强可信度，既需要将排名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又需要允许各学校在排名中有持续浮动的空间。事实上，人们总是期待每所大学都能努力提高自己的排名。

最后，大学排名连同其他绩效相关指标，如评级、基准和标准，被作为更广泛政策工具和评估工具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大学排名“穿梭”于各种情境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有志于评估自己工作和所在机构工作的学者，一直在运用这些工具进行评估。之后，大学排名才被非学术领域以更广泛的社会目的(如效率、问责制和透明度)所采用。

在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人们认为给大学排名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由于大学排名在公共话语中的“归化”(naturalization)，很多关于排名的争论都在围绕“如何”排名展开。与此同时，即使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排名”这一概念也甚少受到严重质疑。

模糊的界限：大学排名的科学

高等教育研究与大学排名的关系一直有些模棱两可。鉴于高等教育研究与政策和实

实践的紧密联系，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研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高等教育公平、高效、有担当等等，也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好。这种明显的规范性倾向带来的一个影响是，高等教育学者经常以保护高等教育为名行事，使高等教育免受学者认为各种有害趋势的影响。由于过去几十年大学排名引用十分广泛，所以大学排名通常被视为有害趋势之一。

因此，很多关于排名的研究都含蓄或明确地批评大学排名这一现象。但矛盾的是，批评似乎比较片面：关于大学排名的学术辩论往往围绕着排名方法及其影响展开，往往会延伸到如何改进，如何开发“更好”的排名。学术研究通常对其认为主要（近乎全部）受商业利益驱动的排名者进行批判分析。由此推而广之，排名机构会受到一定的“适当”动机和行为标准的约束。

因此，这一系列研究不是将排名作为研究观测观察，而是根据排名作为政策或透明度工具的“好”或“真实”程度来评估排名。此类论证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大学排名运用了可靠的方法，衡量了重要的指标，目的不是出于商业利益，人们负责任地使用排名，那么现状会更上一层楼。虽然短期某些排名可能会被低估，但长期来看，上述做法可以进利除害，且大学排名作为评估大学实践的合理性可以得到巩固。我们对此充满期待，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关于排名“如何”的争论，包括如何“完善”排名，本质上肯定了大学排名能促进高等教育。这远远超出了大学排名的使用的方法、代表的利益和使用范围。与此同时，人们视高等教育为大学组成的零和分层秩序（zero-sum stratified order），即所有大学被期望无时无刻不在持续努力超越其他大学。如今，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排名

都将在鼓吹高等教育作为零和竞争秩序的理念，且认为这种理念是“自然”的，甚至“优于”其他可替代概念。

其次，评估大学排名的研究为排名提供了急需的科学合理性。排名机构特别热衷于确保自己排名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并在科学界也被如此对待。在改进大学排名方法、扩大排名影响方面提供建议的学术出版商，可以说是将排名机构视为学术对话的合作伙伴。此类做法危险重重，即以科学可信度支持各种意识形态和政策议程存有风险。类似的风险出现在当学者成为排名委员会和评审小组的一员，或者参加排名活动或完成排名调查时。借助科学的文化权威（通过这些学术专业知识的渠道）对于排名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与科学家一样，是在从事对高等教育世界中存在和不存在的事物做出真实声明的工作。

反思的重要性

上述讨论并非否定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是恰恰相反，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但是所有的批评不能等闲视之。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断审视众所周知的“大局”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至关重要。

实际上，我们应该首先将排名和排名者视为研究对象。与其将排名视为一种已有的高等教育现象，或将排名者视为学术事业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简单将两者视为实证调查的对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两者视为数据。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数据颇有微词，这可能使他人质疑我们是否有正确判断的能力。如果我们期待自己的数据能发挥作用，或者无论如何都要规范自己的数据、对自己的数据抱有期望，那么我们作为学者的可信

度恐怕会受到质疑。警惕上述风险对于我们观测结论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换言之,我们把排名和排名者视为研究对象时,需要客观对待,客观分析。)

坚持任何事物都能“永续”是一种短视思维。以史为鉴,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中的。

如“别无选择”这样众所周知的口头禅最危险的一点可能是,我们说得越多,它就越会成为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挑战人们对社会已有“事实”的理所当然,并努力揭开已有“事实”的意识形态前提,终究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职责。